

論杜國清在《現代文學》、《笠》的譯／介活動

——與戰前世代詩人陳千武的交涉與交錯ⁱ

陳允元ⁱⁱ

摘要

成立於 1964 年 6 月的「笠」詩社，同人由戰前世代、戰間世代及戰後世代共同構成。三個世代的登場，壓縮式地交會《笠》的創刊初期，構成了一種跨越世代的同時代性，其間的交涉與交錯，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本研究以戰間世代的杜國清於 1960~1970 年代在《現代文學》及《笠》的譯介活動為主軸，試圖勾勒出他從艾略特接觸西脇順三郎而抵達日本文學、轉進波特萊爾，並於赴美後研究中國文學，並推動《台灣文學英譯叢刊》，透過翻譯將台灣文學帶向世界的過程；並對照同時期第一世代陳千武的活動，從譯介的面向，探究兩人／兩代人的交涉。他們的交涉，並非線性的世代傳承關係，而毋寧是戰前的日本語世代與戰間／戰後中文世代的台大外文系系統兩條不同的文學脈絡，在 1960 年代台灣的交會、同行與交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與戰前世代的交涉，也使得杜國清追求現代主義的脈絡、路徑與其後的走向，有別於其他台大外文系系統的《現代文學》同人。

關鍵詞：杜國清、陳千武、《笠》、《現代文學》、翻譯、戰間世代、兩個球根

ⁱ 論文初稿，曾宣讀於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之「詩情與詩論：杜國清作品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2017 年 12 月 9 日）。論文之加筆修正，承蒙會議特約評論人楊宗翰教授、與會的阮美慧教授、陳明台教授極具啟發性的建議，以及論文審查期間兩位匿名評論人善意而懇切的指正，獲益良多，藉此機會特別感謝。

ⁱ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On Tu Kuo-ching'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ctivit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Poetry Magazine “Li”:
The Interaction and Difference with the Pre-war Generation
Poet Chen Chien-Wu**

Chen, Yun-Yuan*

Abstract

The “Li” poetry group which gathered in June 1964, consists of pre-war generation, inter-war generation and post-war generation. These three generations compressively met in the early stage of “Li”, and constituted a synchronicity across generations. Hence interaction and difference among generations becomes a topic worth exploring. 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activities by Tu Kuo-ching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poetry magazine “Li” in the 1960s-1970s, trying to outline Tu’s track of literature interest from T.S. Elliot to Nishiwaki Junzaburō and other Japanese modernism poets, Charles Baudelaire, Chinese classic poet Li He, and finally brought Taiwanese literature to the English world through “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Besides, I take pre-war generation poet Chen Chien-Wu as a comparable case, try to find the intera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by examining thei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works. It is not a linear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 and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 but rather two different literary systems, such as the pre-war Japanese language generation and the inter-war/post-war Chinese generation met in the 1960s, walked on the same road shortly and then staggered. It is also worth noting that due to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re-war generation, the context, route and the subsequent direction that Tu pursued modernism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members of the “Modern Literature” group.

Keywords: Tu Kuo-ching, Chen Chien-Wu, poetry magazine “Li”, “Moder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ter-war generation, two rhizomes

一、前言：世代的交涉與交錯

關於成立於1964年6月的「笠」詩社同人在世代上的結構組成，陳明台將之分為三個世代，包括：一、戰前的世代；二、介乎戰前和戰後的世代；以及三、戰後出生的世代。作為第一世代的「戰前的世代」，陳指出其在時間上：「大抵是戰中成長的世代，或者親身經歷的戰爭，或者在殖民地（日本統治）時期已具有成熟的思考、判斷力，正值青春期，而且同時經驗過殖民以及戰後新時代來臨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階段」，在語言上則係「陷落在語言的谷間」（日文／中文）的「跨越語言的一代」¹；而「介乎戰前和戰後的（第二）世代」儘管同樣出生於戰前，但遲至1930至1940年代方出生的他們：「在戰中或戰後，多還居於幼少年期」²；「他們在戰後，置身於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國民政府的接收、支配台灣）」³、「大抵是接受完整的中國教育成長的世代」⁴。至於第三世代，則是「戰後（1945年以後）出生的世代」。雖然是三個世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戰後台灣在1946年10月25日起廢止了日文版報紙、雜誌之故，第一世代雖在戰前即已藉由日文展開初步的文學活動，但除了少數作家例如林亨泰（1924-）、吳瀛濤（1916-1971）、錦連（1928-2013）等較早嘗試以中文發表詩作（或委由他人中譯）⁵，能夠重新活躍於1950年代初期的中文文壇，大多數的第一世代（日語／跨語世代）係與第二世代（中文世代）同時登場於1964年《笠》創刊的前後；而戰後出生的第三世代則以鄭炯明（1948-）、陳明台（1948-）為始，在創刊兩週年的第13期（1966年6月）

¹ 陳明台，〈鄉愁論——台灣現代詩人的故鄉憧憬與歷史意識〉，《逆光的系譜：笠詩社與詩人論》（台北：前衛，2015年），頁15-16。

² 陳明台，〈鄉愁論〉，頁24。

³ 陳明台，〈世代的傳承，風格的形成——笠詩社的少壯派詩人論〉，《逆光的系譜》，頁116。

⁴ 陳明台，〈鄉愁論〉，頁24。

⁵ 以紀弦主導的《現代詩》季刊為例，第2期（1953年5月）刊載林亨泰的作品〈第一信〉（葉泥譯）；第3期（1953年8月）刊載瀛濤（吳瀛濤）的作品〈神像等四首〉、詩論〈原子詩論〉；第十期（1955年夏季出版）刊載錦連的作品〈古典及其他四首〉。以上參考《創世紀》詩刊編輯部編、麥穗校訂增補，〈《現代詩》季刊（一～四十五期）作品目錄彙編〉，收入麥穗，《詩空的雲煙：台灣新詩備忘錄》（台北：詩藝文出版社，1998年），頁245-284。

首度登場。戰前、戰間、戰後三個世代的登場，壓縮式地交會《笠》的創刊初期，構成了一種跨越世代的同時代性；「笠」詩社不同世代同人間的交涉與交錯，於是成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

「笠」跨世代同人交涉最緊密的案例，也許是戰前世代的陳千武（1922-2012）與戰間世代的杜國清（1941-）。杜國清曾多次闡述他與陳千武之間深刻的文學因緣。事實上，他們的交涉並非始自於《笠》，而是要進一步追溯至創刊於1960年的《現代文學》。杜國清在〈從《現代文學》到《笠》〉（2006）寫道：

陳千武是我的表姊夫，可是我在六〇年代初進入台灣大學之後，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詩人，書房裡大部分的藏書都是詩集或詩刊雜誌。他在日治時代末期就開始以日文寫詩，光復以後，開始學習中文，……他將已發表或未發表的作品拿給我，我也自告奮勇替他修改中文。詩談多了，作品看多了，我也開始嘗試寫詩，請他修改，一直持續到1966年我到日本求學的時候。……沒有他的影響以及這段因緣，我不可能在1961年大三時加入《現代文學》雜誌的行列，也不可能在1964年參與《笠》詩刊的創刊。⁶

在杜國清的自述裡，陳千武對之的影響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在創作上，二則是在翻譯上。前者落實在兩人之間「創作上互相滲透的現代主義特質」⁷；後者則體現在杜國清翻譯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時乃同時參照陳千武的日譯本藏

⁶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原題：〈「現代文學」から「笠」へ〉），初出：《現代詩手帖》（2006年8月），中文版收入杜國清，《詩論·詩評·詩論詩》（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頁323-324。

⁷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328。

書⁸，並請陳提供日文的諮詢⁹。於是，杜國清曾言：「當年在創作和翻譯上對現代主義的追從，從《現代文學》到《笠》是一脈相承的」¹⁰；這樣的「一脈相承」，實際上都有著陳千武的影響。透過陳千武，在戰後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文世界成長的杜國清，某種程度上間接繼承了戰前日本語世代作家的文學養分、延展了閱讀觸角。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稍前所言，作為日本語世代的陳千武在戰後必須「跨越語言」才能「重返」文壇。這樣的「重返」不僅是遲到的，同時，面對一個迥異於戰前的全新的文學場域，其需要跨越的並不僅止語言的轉換，更必須重新取得戰後文壇的入場券。對陳千武而言，杜國清雖身為晚輩、卻是「接受完整的中國教育成長的世代」，反而成為他在戰後重返文壇的重要引路人。杜國清回憶：「在加入現代文學雜誌社之後，我也將他的作品拿到《現代文學》上發表……大三時我擔任《台大青年》的主編，還擅自把他的〈雨中行〉，發表在這個學生刊物上……儘管他不是台大的學生，可見當時我們能夠發表的地方是多麼有限，而我努力為陳千武的作品找到發表園地是多麼心切」¹¹；除此之外，陳千武的第一本中文詩集《密林詩抄》（1963）能夠順利在現代文學社出版，杜國清更是為之掛保證：「由於陳千武是日據時期就開始寫詩的人，以當時政府和社會還有普遍反日情緒，王文興非常敏感，態度也很謹慎，問我陳千武的作品會不會有問題……當時我向王文興保證，陳千武是我的表姐夫，我對他的作品非常了解，絕對不會有任何問題。終於獲得王文興的同意」¹²。杜國清之所以能夠成為前輩陳千武在戰後重返文壇的引路人、提攜者，原因無他，除了受到完整的中文教育，同樣重要的，由於杜國清就讀於台大外文系，

⁸ 杜國清：「當時，初生之犢不怕虎威，我之所以膽敢翻譯艾略特以晦澀艱深出名的大塊詩章，勇氣來自陳千武的藏書。在翻譯《荒原》之前，我在他的書房裡看到艾略特的兩種日文翻譯本」。〈從《現代文學》到《笠》〉，頁324。

⁹ 杜國清謂其翻譯艾略特《荒地》之過程：「原文有疑義的地方即參照日譯；日文有疑義的地方即請教桓夫：因此這首詩能夠譯成，桓夫之功莫大焉。」杜國清，〈關於「荒地」〉，《現代文學》28期（1966年5月），頁65。

¹⁰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326。

¹¹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327。

¹²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328。

使他自始便已置身「現代文學雜誌社」的社群網絡之中，成為同人，甚至成為編輯。杜國清在戰後台灣中文文壇的象徵之本，此時顯然高過正苦心進行語言轉換、殖民地經驗又遭人警戒的前輩陳千武。

因此，我們很難以線性、單向的世代傳承關係，理解陳千武與杜國清之間的文學活動交涉。儘管他們幾乎在同一個時間點登場於戰後台灣的中文文壇、交會於《現代文學》與《笠》、追求現代主義美學，並在創作之外致力於相關詩與詩論的譯介活動，但他們的交涉，毋寧是戰前的日本語世代與戰後中文世代的台大外文系系統兩條不同的文學脈絡，在 1960 年代台灣的交會、同行與交錯；同時，由於與戰前世代陳千武的交涉，也使得杜國清追求現代主義的脈絡、路徑與其後的走向，有別於其他台大外文系系統、多數屬於外省籍作家的《現代文學》同人。這在他的譯／介活動可以看得特別清楚。這一篇論文，我將重新檢視 1960～1970 年代杜國清在《現代文學》與《笠》的譯／介活動，探討其與前輩陳千武的交涉與差異。

為此，我整理了杜國清翻譯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的〈飛〉刊登於《現代文學》第 12 號的 1962 年 2 月、至 1976 年其波特萊爾譯詩選在《笠》連載完畢的十四年間，杜國清在兩雜誌的發表紀錄，方便討論參照。

二、荒原／荒地／荒地派：兩代的視差

1962 年 2 月杜國清在《現代文學》登場時，已與陳千武展開交流，¹³但他的文學活動基本上是台大外文系系統《現代文學》脈絡的延續，包括他對 T. S. Eliot 詩與詩論的翻譯。¹⁴

關於 T. S. Eliot 在戰後台灣文壇的引介，陳芳明在〈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2013)試圖透過其中文譯名「厄略脫／艾略特／歐立德」

¹³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 323-324。

¹⁴ 在翻譯艾略特前，杜國清的翻譯包括：史坦貝克〈飛〉（《現代文學》第 12 期，1962 年 2 月）、葉慈詩選（《現代文學》第 13 期，1962 年 4 月）。

闡述 T. S. Eliot 被介紹到台灣的三個階段。在「厄略脫」與「艾略特」混用的 1950 年代，¹⁵陳芳明指出：「在最初的文化接觸階段，厄略脫或艾略特代表的是一種嘗試的譯名。艾略特的譯名，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才普遍為台灣所接受。用功最深的，當推余光中。他的推廣，意味著台灣詩壇已逐漸能欣賞並消化艾略特建立起來的美學」¹⁶。於是陳將 1960 年視為 T. S. Eliot 被引介至台灣的階段的分水嶺，認為此後：「艾略特詩與詩觀似乎從此就嵌入台灣現代詩運動的脈絡」¹⁷。而在這樣的脈絡中，台大外文系系統的《現代文學》在 1960 年代 T. S. Eliot 翻譯風潮中扮演的角色無疑是重大的。陳謂：「《現代文學》是 1960 年譯介艾略特的詩與批評最多的文學刊物……艾略特的經典作品，幾乎都可以在《現代文學》發現」¹⁸。除了陳芳明，洪淑苓在〈論杜國清的譯介〈荒原〉、詩學與近期詩集〉（2016）將《現代文學》T. S. Eliot 相關篇目做了列表，同樣指出《現代文學》在此風潮中的重要性；在這個園地，洪謂：「杜國清也因參與編輯工作，所以提供多篇譯稿與評論」¹⁹。換言之，在杜國清著手翻譯艾略特的詩與詩論之前，艾略特在 1960 年代的台灣文壇已形成風潮；其之所以接觸 T. S. Eliot 並產生極大的興趣，是在台大外文系系統《現代文學》的延長線上進行的。杜國清寫道：

《現代文學》的出版，一開始就是雙管齊下，一方面發表文學創作，一方面譯介外國現代派作家。我當時，除了發表自己的創作之外，也竭力所能翻譯艾略特的作品，包括艾略特的第一本詩集《普魯佛洛克與其他的觀察》和名

¹⁵ 1954 年《現代詩》第 8 期，方思首先以〈厄略脫詩論〉將 T. S. Eliot 介紹到台灣；而在詩的方面，最早是在 1957 年《現代詩》第 19 期由葉冬翻譯的〈艾略特詩三章〉。參見陳芳明，〈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台北：聯經，2013 年），頁 150。

¹⁶ 陳芳明，〈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頁 148。

¹⁷ 陳芳明，〈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頁 152。

¹⁸ 陳芳明，〈艾略特與余光中的詩學對話〉，《現代主義及其不滿》，頁 20。

¹⁹ 洪淑苓，〈論杜國清的譯介〈荒原〉、詩學與近期詩集〉，《孤獨與美：台灣現代詩九家論》（台北：釀出版，2016 年），頁 141。

作《荒原》。……我當時深深感到要從事新詩創作，不能不了解西方的現代詩；要了解西方的現代詩，不能不了解艾略特。²⁰

此外，他也在〈我與《現代文學》〉（1991）謂：「當時，詩人艾略特的名聲正達顛峰，文學史的書上已標示二十世紀最是艾略特的時代。我既然立志寫詩，取法乎上，艾略特自然而然成為我研究學習的對象」²¹。這無疑是戰後台灣典型的英美文學人的思維路徑。亦即，中文創作的現代化，必須取徑自西方現代文學經典。在這一點上，杜國清與其他《現代文學》的外文系前輩、同輩人們並無二致。但不同的是，在翻譯的路徑上，除了作為原文的英文，杜國清很大程度上參考了陳千武借他的日文譯本：

我之所以膽敢翻譯艾略特已晦澀艱深出名的大塊詩章，勇氣來自陳千武的藏書。在翻譯《荒原》之前，我在他的書房裡看到艾略特的兩種日文翻譯本：一是收錄在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名詩集大成》中西脇順三郎的翻譯本，另一是他不久之前在從日本買到的上田保的新譯本《エリオット詩集》。在參考日文譯本的對照下，我開始大量翻譯艾略特的論文和詩作。²²

杜國清這裡所提到的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名詩集大成》，應係 1958-1960 年平凡社出版的共 18 卷的版本。而西脇順三郎（1894-1982）的譯本，是戰後最廣為流傳的

²⁰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 324-325。

²¹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收入《現代因緣》（台北：現文出版社，1991 年），頁 90。

²² 杜國清，〈從《現代文學》到《笠》〉，頁 324-325。在刊載於《現代文學》第 28 期（1966 年 5 月）的〈關於「荒地」〉，杜國清詳述了他在譯註這首詩主要的參考資料，包括：「一、『荒地』，西脇順三郎日譯本，桓夫供給。二、『荒地』，上田保日譯本，桓夫供給。三、『A Reader's Guide to T. S. Eliot』 by George Williamson，趙天儀兄供給。四、『T. S. Eliot's Poetry and Plays, a Study in Sources and Meaning』 by Grover Smith，翁廷樞兄、鄭恆雄兄供給」。頁 65。

譯本。²³至於杜國清所說上田保（1894-1980）的新譯本《エリオット詩集》，指的應該是1954年由白水社版的《エリオット詩集》。但上田保翻譯艾略特的詩並不是在戰後，而是戰前。事實上，上田保是日本最早翻譯艾略特《The Waste Land》的人。²⁴1938年8月，他在作為戰爭時期最重要的現代主義詩誌的《新領土》（1937-1941）發表了譯詩《荒地》。將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翻譯為「荒地」的譯法，便在日本語世界正式定調了下來，同時這也成為鮎川信夫（1920-1986）在戰時創刊《荒地》並在戰後集結為「荒地派」作為日本戰後詩的再出發的重要象徵援引。這一條線索與「笠」第一世代同人的連結，容稍後討論。有趣的是，正因為取徑自日譯本，杜國清直接援用了日譯的漢字將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翻譯成「荒地」，而非一般在中文世界更為普遍的「荒原」。在1966年5月刊載於《現代文學》第28期的作為〈荒地〉之譯者前言的〈關於「荒地」〉一文，杜國清除了提及他主要的參考資料有西脇、上田的日譯本等，也概述了已知的中譯本，包括趙蘿甦女士在戰前的譯本（1937年。當時杜國清未見），以及1961年葉維廉在《創世紀》第16期的譯本《荒原》。²⁵作為中文世界的第三個譯本，杜國清取「荒地」而棄「荒原」，也許是有意與葉維廉的譯本《荒原》互別苗頭²⁶，但「荒地」的譯法在當時的、以及後來的中文世界中幾乎是獨樹一格的，這顯示了杜國清的艾略特翻譯並非僅是一般「英文→中文」的單線路徑，而是加入了「日本」這個中介或輔助因素。關於這點，陳芳明曾以1969年杜國清翻譯出版的《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為例指出其中的日本因素：

²³ T.S.エリオット著、西脇順三郎譯，《荒地》（東京：創元社，1952年）。

²⁴ 1929年12月，上田保即在引領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的重鎮《詩と詩論》第6號上發表〈T・S・エリオットについて〉。不過此時艾略特在日本的譯介多以評論為主。

²⁵ 杜國清，〈關於「荒地」〉，《現代文學》第28期，頁65。

²⁶ 關於荒原／荒地譯法的選擇，杜國清教授在本文初稿宣讀後表示，這兩個譯法事實上當時的他甚至到了校對階段都還猶豫著，一半一半。不過在語感的表現上，他認為「荒原」是中文世界美化過的譯法，但「荒地」似乎比較接近他讀到的感覺。

這冊譯作的重要特色是，杜國清借助許多日文的譯本。他的日文閱讀能力在那段時期也許遠勝於英文。這個例子，可以反映翻譯的現代性在台灣的複雜淵源。如果台灣社會沒有過日本殖民的經驗，知識份子的日文閱讀絕對不可能出現杜國清那樣的能力。艾略特的英文，假道日文途徑，而獲得中文的表達，是一個值得再思考的議題。²⁷

陳芳明認為杜國清「假道日文途徑」的艾略特翻譯「可以反映翻譯的現代性在台灣的複雜淵源」，無疑是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這事實上也是陳千武於 1970 年所提出的戰後台灣現代詩的源流並非單一而係由「兩個球根」構成的例證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戰間期出生、而在戰後接受完整的中文教育的「笠」第二世代的杜國清，其日語能力的獲得並非陳芳明所述的：「如果台灣社會沒有過日本殖民的經驗，知識份子的日文閱讀絕對不可能出現杜國清那樣的能力」²⁸，而是戰後習得的。陳芳明似乎將《笠》的戰間世代與戰前世代混同了。事實上，台大外文系出身的杜國清翻譯艾略特《荒地》或其他詩作評論仍是透過英文，而非日文，他在〈關於「荒地」〉寫下了他的翻譯原則：「原文有疑義的地方即參照日譯；日文有疑義的地方即請教桓夫：因此這首詩能夠譯成，桓夫之功莫大焉」²⁹；他之所以擁有高度的日本語閱讀能力，是因為在翻譯《荒地》過程中發現了：「翻譯西洋的文學作品，如果能借助於日文翻譯，實在是事半功倍」³⁰，加上自費留學美國必須繳交的保證金難以負擔之故，故決定在赴美前先留日，「決心要把日文學好，再繼續研究英美文學」³¹。換言之，杜國清也許由於出身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本島人家庭之故，對於日本語有一定程度的基礎或親近感，但足以勝任文學翻譯的高度的日本語能力並非

²⁷ 陳芳明，〈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頁 152-153。

²⁸ 陳芳明，〈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頁 153。

²⁹ 杜國清，〈關於「荒地」〉，《現代文學》28 期，頁 65。

³⁰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頁 92。

³¹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頁 92。

在戰前自然習得的，而是在戰後必須戮力學取的「外文」；同樣的，「日本」之所以成為其翻譯艾略特的中介或輔助因素亦非必然，而無疑是戰前即在殖民地台灣以日本語為中介吸收文學養分、進行創作的日本語世代（同時也是「笠」第一世代）作用在戰間出生的「笠」第二世代的杜國清身上的痕跡。兩代之間雖有交涉傳承之處，但這至為關鍵的一點，必須進一步分別清楚。

討論至此，我們可以看到，戰間出生的杜國清，其戰後與艾略特的接觸係在台大外文系系統《現代文學》脈絡的延長線上。但由於與戰前日本語世代陳千武的交往，使之在一般外文系的「英文→中文」的翻譯路徑之外，更「外掛」了「日文譯本」作為中介與參照。於是他援用了上田保、西脇順三郎的翻譯，將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翻譯為「荒地」；但對杜國清而言，日本／日本語及其背後負載的文學史脈絡畢竟是外掛、是選項之一、是用以理解西方文學的媒介，而非最終目的。這使日本／日本語之於他的意義，有別於陳千武等戰前日本語世代的「笠」第一代作家。³²

兩代差異的例證之一是，對於「笠」的第一代作家而言，「荒地」有另一層重要意涵，就是台灣戰前世代在戰後的再出發，以及與日本「荒地派」的類比對位。這層意義對於「笠」第二代的杜國清而言是稀薄的。作為日本戰後現代詩之出發的「荒地派」之前身的，係在戰爭期的1939年3月由鮎川信夫擔任編輯兼發行人而創刊的《荒地》（～1940年12月，共六號。第6號改題為《文芸思潮》）。關於這份雜誌及其命名，根據宮崎真素美：「這是早稻田第一高等學校在學的文學同好們熱切投入的雜誌，其誌名起因於艾略特的長詩《*The Waste Land*》，將第一次大戰戰後歐洲的精神性荒廢、與自己所置身的時代狀況重合而來的」³³；樋口良澄進一

³² 相對於戰間或戰後的中文世代，戰前世代的日本語能力也許可稱為「內建」，雖然這種「內建」也是學習的結果。

³³ 宮崎真素美，〈戰後詩の出發〉，收入和田博文編，《近現代詩を学ぶ人のために》（東京：世界思想社，1998年），頁220。

步提供了誌名緣由的具體線索：「誌名《荒地》並不是鮎川所提案，但在扉頁依其意向刊載了艾略特的〈荒地〉的詩句。第5號刊載了鮎川與桑原英夫、金炳文共譯的艾略特的《荒地》第五部分。……鮎川在《詩與詩論》上讀到了艾略特。而在《新領土》，1938年8月號刊載了由上田保翻譯的《荒地》第一部〈死者的埋葬〉」³⁴。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艾略特《The Waste Land》、到上田保日譯的《荒地》、再到鮎川信夫的詩誌《荒地》（戰前）的連結。終戰後的1947年9月，鮎川信夫與田村隆一（1923-1998）等再度以「荒地」為名結成詩誌《荒地》（～1948年6月，共六號），成為日本「戰後詩」的出發點；並於1951～1958年發行年刊《荒地詩集》共八回。主要成員除了前述的鮎川信夫、田村隆一外，尚包括北村太郎（1922-1992）、黑田三郎（1919-1980）、中桐雅夫（1919-1983）、三好豐一郎（1920-1992）、吉本隆明（1924-2012）等。這一批詩人被稱為「荒地派」。其之所以取「荒地」象徵，樋口良澄認為這與「荒地的重生」有關：

「不毛之地」被與春作為對比，訴說著朝氣蓬勃的再生。所謂四月，是度過冬天生命再生之月。鮎川的譯文也生氣勃勃。關於誌名「荒地」，正如創刊當時所寫下的「覺得好像適合用以暗示也許終於不毛的我們的文學前途」，思索第一次大戰後的荒廢，通過戰爭，那之中注入嶄新的「再生」的意味。³⁵

類似的「荒地與重生」的情境，也相應地呈現在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太平洋戰爭的「笠」的戰前世代詩人身上。陳千武之子陳明台即在〈死和再生——桓夫和鮎川信夫詩中共通主題的比較〉（1997）一文，指出作為「笠」之核心的桓夫（陳千

³⁴ 樋口良澄，《鮎川信夫、橋上の詩学》（東京：思潮社，2016年），頁80-81。

³⁵ 樋口良澄，《鮎川信夫、橋上の詩学》，頁82-83。

武)與作為「荒地派」之要角的鮎川信夫兩人:「都是屬於所謂戰中的世代,在日本軍國主義支配的一切時期度過了青春時代,並且親身體驗過所謂『大東亞戰爭』」³⁶。而在終戰之後,「他們共通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出發;一言以蔽之,鮎川面對著戰後日本的焦土(精神的荒廢),桓夫則面對著語言的劇變(文化的適應)」³⁷。與日本「荒地派」之間的共通性與對話性,作為戰前世代的陳千武顯然是清楚意識到這一點的。儘管在《笠》創刊之初,他曾更致力於戰前日本現代主義詩的譯介與系譜的追求。我在另一篇文章指出,《笠》在創刊初期,同人們共同的方向有二:一、譯介戰前日本前衛詩重鎮《詩と詩論》的重要同人的詩作,並介紹日本近代詩史、重要詩人的詩論;二、以銀鈴會/「笠」同人之詩經驗(與詩淵源)為中心,累積詩史資料,建構《詩と詩論》(戰前)—「銀鈴會」(戰前戰後過渡)—「笠」(戰後)的影響系譜。³⁸「笠」同人透過這兩個方向,一方面追溯戰前日本現代主義運動的美學系譜、建構日治以降台灣有別於五四新文學系統的獨自的文學傳統(日治以降的球根),同時也針對以中國來台的外省籍詩人主導的現代主義運動提出對抗論述、或向日本現代主義汲取養分以參與運動。在《笠》的第1~6期(1964年6月~1965年4月),陳千武陸續翻譯了三好達治(1900-1964)、北園克衛(1902-1978)、西脇順三郎、上田敏雄(1900-1982)、山中散生(1905-1977)、以及春山行夫(1902-1994)的詩作並進行介紹,加上稍前的1962年6月他在《現代文學》第14期發表的北川冬彥(1900-1990)作品中譯,悉數都是以《詩と詩論》為中心展開的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的重要人物,很清楚的顯示出追求並連結戰前日本現代主義美學系譜的趨向。值得注意的是,從《笠》邁向第二年的第7期之後,陳千武開始將翻譯的焦點從戰前的現代主義旗手移轉至戰後的「荒地派」詩人,

³⁶ 陳明台,〈死和再生——桓夫和鮎川信夫詩中共通主題的比較〉,《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1997年),頁231。

³⁷ 陳明台,〈死和再生——桓夫和鮎川信夫詩中共通主題的比較〉,頁237。

³⁸ 參見拙著,〈尋找「缺席」的超現實主義者——日治時期台灣超現實主義詩系譜的追索與文學史再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6期(2013年4月),頁25。

包括：三好豐一郎（第 7 期）、田村隆一（第 8 期）、鮎川信夫（第 9 期）、各務章（第 10 期）、黑田三郎（第 11 期）、吉本隆明（第 12、20 期）、北村太郎（第 13 期）、中桐雅夫（第 14、19 期）、木原孝一（第 15 期）、中村千尾（第 16 期）、峠三吉（第 17 期）、醍醐華夫（第 28 期）；與譯作作為搭配的，在 1967 年 6 月的第 19 期，以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1926-）進行為期兩週的訪台之旅為契機，陳千武開始翻譯高橋為《笠》所特別撰稿³⁹的〈日本戰後詩史〉，共連載八回（～第 28 期〔1968 年 12 月〕）。高橋的〈日本戰後詩史〉，即是以「荒地派」為起點展開。

如果說，前述《笠》創刊初期的兩個方向著眼的是《詩と詩論》與《笠》之間影響的溯源、以及台灣文學史主體脈絡的建構，第 7 期之後陳千武對於「荒地派」詩人的譯介，則是一種「從荒地再生」的類比與對位，同時也是對於正在發展中的日本詩壇動態的掌握。《笠》的創刊對於陳千武而言的意義，正如阮美慧在〈陳千武在《笠》發展史上的地位〉（2005）所指出的：「不僅是他文學生命的再出發，同時更肩負一分對台灣文學發展的責任與使命」⁴⁰。溯源（日本現代主義）、主體的建構與傳承（戰前台灣新文學→戰後台灣文學）、再出發（「荒地派」的自喻），大致可以用以概括陳千武在《笠》的文學活動，而這些活動也都必須以日本語為媒介，指向或連結了特定的歷史脈絡。所謂「荒地」一詞，對「笠」第二代同人而言也許只是艾略特《*The Waste Land*》的日文譯名，但對於戰前世代的第一代同人而言，它進一步指向了戰後日本的「荒地派」並做為自喻。它是乘載了在戰前度過青春歲月並親身經歷了大東亞戰爭的這一代人，在戰後精神的物質的荒地之中重新出發的人生象徵。

³⁹ 高橋喜久晴在〈給笠詩社同人〉寫道：「我本身，借陳千武氏的話來說，已經是笠詩誌的日本特派員了。因而，已有在本誌今後每期寫報告的義務，我會認真履行這一義務的。」《笠》第 19 期（1967 年 6 月），頁 47。在當期的〈日本戰後詩史（一）〉，他也寫下了：「為了《笠》我可儘量努力以赴」。頁 44。

⁴⁰ 阮美慧，〈陳千武在《笠》發展史上的地位〉，初出：《東海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5 年 7 月），收入阮美慧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0 陳千武》（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年），頁 361。

三、艾略特以後：從日本文學／西脇順三郎、波特萊爾到李賀

日本語之於「笠」第二代的杜國清，與其他外語同樣，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工具、媒介。他的日本語能力並非因日本殖民經驗而獲得，而是在翻譯艾略特的過程中發現：「翻譯西洋的文學作品，如果能借助於日文翻譯，實在是事半功倍」⁴¹。於是決定赴日「要把日文學好，再繼續研究英美文學」⁴²。亦即，日文是後天習得，且僅是借道，終點仍是英美文學。惟在赴日之後，他的方向產生了轉變：

結果，我到了日本，在東京大學*英美文學系研修了一年，開始翻譯艾略特的文學評論。可是，一年之後，我又決定轉攻日本文學。出國前翻譯艾略特的作品時，參考了西脇順三郎的名譯，使我對西脇順三郎本人的詩和詩論大感興趣，終於選了他做為我的碩士論文的題目。在我的文學生涯中，由艾略特到西脇，這段因緣，不能說不是《現代文學》促成的。⁴³

杜國清的這段自陳，再次顯示了他對日本語／日本文學的興趣，乃是為翻譯英美文學（艾略特）而觸發（當然，還有陳千武的推波助瀾），而非世代的「內建」。1966年6月，杜國清前往日本，擔任大阪中國語文學院講師。1967年入京都大學⁴⁴英美文學科研修一年。1968年入關西學院大學攻讀碩士，正是從英美文學轉向日本文學研究，1970年3月獲碩士學位，⁴⁵碩士論文以西脇順三郎為主題。同年8月赴美史丹佛大學東亞系攻讀博士學位。在日的五年間（1966年6月～1970年8月），

⁴¹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頁92。

⁴²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頁92。

⁴³ 杜國清，〈我與《現代文學》〉，頁92-93。

*處的說明：杜國清這裡的敘述是「東京大學」，惟在《光射塵方·圓照萬象 杜國清的詩情世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的附錄·杜國清寫作平年表記載為「京都大學」。

⁴⁴ 同上註*之說明。此以《光射塵方·圓照萬象 杜國清的詩情世界》的附錄年表為準。

⁴⁵ 關於取得碩士學位時間，《光射塵方·圓照萬象 杜國清的詩情世界》的附錄年表在1969年與1970年重複了兩次。依時程推測應以1970年為合理。

杜國清持續在《笠》發表艾略特的譯詩，同時完成並出版了《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1969年3月）以及西脇順三郎《詩學》（1969年12月）。而在從英美文學轉向日本文學研究之後，杜國清在《笠》第一個值得注目的譯介業績，當屬1971年2月在《笠》第41期起以「唐谷青」之筆名⁴⁶撰寫的〈日本現代詩鑑賞〉，連載共十二回，至1973年12月的第58期為止。

唐谷青的〈日本現代詩鑑賞〉既名為「鑑賞」，它便不只是停留在一般在譯詩前後加上詩人簡介、或略紓譯者感想一二的「譯詩選」模式，而是綜合了詩人的生平略歷、詩論、技法、思潮與文學史脈絡、譯詩、以及細密而紮實的詩歌分析的十二篇力作。這十二篇〈鑑賞〉，分別介紹了以下十二位詩人：

一、西脇順三郎；二、安西冬衛；三、北川冬彥；四、三好達治；五、村野四郎；六、丸山薰；七、草野心平；八、金子光晴；九、田中冬二；十、安藤一郎；十一、伊東靜雄；十二；笹澤美明。

上述的十二位詩人，除了金子光晴（1895-1975）、田中冬二（1894-1980）⁴⁷以及伊東靜雄（1906-1953）三位未曾在戰前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重鎮《詩と詩論》（及後續誌《文學》）登場，其他九位皆曾在《詩と詩論》發表。就大方向而言，這十二名詩人多數屬現代主義的系譜上或延長線上的詩人，惟系譜的親疏、後續的動向有別：西脇順三郎創立日本第一份超現實主義詩誌《馥郁タル火夫ヨ》，是日本超現實主義詩運動的核心人物；安西冬衛（1898-1965）與北川冬彥以大連的《亞》為據點發跡，係短詩運動旗手，後加入《詩と詩論》。北川左傾後另創《詩・現実》；三好達治、丸山薰（1899-1974）出身《椎の木》、《詩と詩論》，後成為「主知的抒

⁴⁶ 「唐谷青」之日文唸法「とうこくせい」與「杜國清」同音。

⁴⁷ 田中冬二雖然未曾在《詩と詩論》發表，但1931年3月《詩と詩論》第11號刊有龜山勝的評論〈田中冬二氏詩集《海の見える石段》読後〉。

情」系譜的「四季派」代表。未曾在《詩と詩論》發表的田中冬二亦是「四季派」抒情詩的代表人物；村野四郎（1901-1975）與笹澤美明（1898-1984）出身《詩と詩論》及其後續誌《文學》，係德國「新即物主義」在日本的引介者與先驅者；草野心平（1903-1988）雖曾在《詩と詩論》發表，但系譜較偏向人生派，離現代主義較遠，創有詩誌《歷程》；英國文學學者・詩人安藤一郎（1907-1972）在《詩と詩論》發表不少英美詩的譯作與評論。伊東靜雄屬「日本浪漫派」重要詩人。金子光晴則詩風多變，大致從高踏耽美轉向現實批判。⁴⁸

杜國清〈日本現代詩鑑賞〉的十二名詩人名單，大方向上仍是以戰前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為中心展開的；但若與陳千武在《笠》譯介的詩人對照來看，可以發現有兩個極大的不同：其一、就現代主義的系譜而言，陳千武極重西方的前衛美學思潮在日本的主要引介者，並在抒情與主知的辯證關係中傾向高度的主知主義。換言之，強烈的實驗精神是他所側重的——西脇順三郎、上田敏雄、山中散生、北園克衛、春山行夫皆屬之。特別是春山行夫，他是《詩と詩論》的編輯者，也是徹底的主知主義者。他將詩視為純粹的符號與技術，對於由民眾詩派、主情詩派、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主導的主流詩壇發動攻擊與清算。十二人名單中唯一的例外，是對主知主義抱持修正主義的抒情詩人三好達治。但陳千武仍強調其抒情性中的主知成分：「這種新的抒情詩，已不像昔時那一般將發生在內心的情緒照原形的言語單純地迴響出來，那是依據各種主知的經驗予以冷卻和壓縮，或與其他的精神要素複雜地化合，經過了曲折的途徑而反響回來的」⁴⁹。但杜國清〈日本現代詩鑑賞〉譯介的十二位詩人，儘管大多與《詩と詩論》或現代主義美學系譜有所關連，但與其說是強調實驗精神、強調主知，不如說呈現出昭和初期《詩と詩論》現代主義詩運動以

⁴⁸ 以上詩人簡介，主要參考原子朗編，《近代詩現代詩必攜》（東京：學燈社，1989年）。

⁴⁹ 陳千武，〈關於三好達治〉，《笠》創刊號（1964年6月），頁21。順帶一提，陳千武文中提及三好達治「上月（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病歿於東京……此一病歿消息曾由日本各電台向全世界廣播」，時點的因素，可能是陳將譯介於《笠》創刊號之故。

降各種的修正、轉化與質變，而其中在一定的比例上屬於具有抒情傾向的詩人。例如三好達治、丸山薰、田中冬二都是具有修正主義、抒情傾向的「四季派」，而伊東靜雄屬於耽美浪漫、回歸日本傳統的「日本浪漫派」。這樣的譯介系譜，也許與杜國清自身傾向浪漫之美學特質相關。⁵⁰

而杜國清與陳千武譯介名單的另一個差異是，陳千武除了譯介戰前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的六位詩人之外，在《笠》第7期之後大量且集中地譯介戰後日本「荒地派」詩人的作品；而杜國清的〈日本現代詩鑑賞〉譯介的十二位詩人，雖也提及詩人們在戰後的動向，但原則上仍側重於戰前的文學活動，且他們並不屬於「荒地派」。——當然，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陳千武已經大量譯介了戰後日本「荒地派」作品，杜國清因此無須再次重複；但這也許反映了戰前戰中的兩個世代對於日本文學系譜接受的差異。

如同稍前已討論的，作為戰前世代／日本語世代／跨語世代的陳千武，透過日本語完成日本文學影響下現代主義美學系譜的接續、以及文學史主體的建構；而成長於戰後台灣中文世界的杜國清，則是藉之踏上了長而曲折的美學追尋之路。特別是擁有英語、日語雙外語能力的他，更以這兩種外語相互參照、發明，開創出一條與戰前第一世代極為不同的獨特途徑。為了翻譯艾略特，他藉助了日文譯本並開始對譯者之一的西脇順三郎的詩與詩論產生高度興趣，終而投入了日本文學研究。但也因為西脇順三郎，他重新意識到現代主義先驅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的價值。在〈日本現代詩鑑賞〉連載中的1972年4月，他從《笠》第48期開始連載波特萊爾《惡之華》譯稿，一直持續至1976年8月《笠》的第75期。在〈寫在翻譯「惡之華」之前〉，杜國清敘述了他翻譯波特萊爾的契機：

⁵⁰ 杜國清在〈從《現代文學》到《笠》〉反覆提及他與陳千武在作品方面相濟互補關係是：「我的浪漫氣質給他的作品一些抒情氣息，而他的人生經驗給予他的作品難得的知性要素」、「在我早期的抒情作品中，能有冷靜的知性思考和成熟的技巧表現，我必須承認，其影響來自陳千武」。頁330、333。

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所謂「心靈的戰慄」，是在到了日本從日譯本中讀到這本書（《惡之華》——引用者註）的時候。……此外，從西脇順三郎的「詩學」中，我知道了波特萊爾的詩論具有相當的價值：尤其是認為「超自然」（transcendental）與「諷刺」（ironie）是詩的本質這種基本的理論。他的詩絕不是單純地反映生活的作品；無寧說他的作品是一個機械裝置（mechanism），而他的生活也只是構成這個機械裝置的零件或要素。換句話說，他的作品不是生活中自然流露的產物，而是以生活為材料，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藝術的世界。⁵¹

杜國清藉由西脇而意識到波特萊爾的價值，十分值得討論。一般而言，我們將西脇順三郎視為日本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旗手，因為他曾寫下了給予日本對於超現實主義理解極大影響的《超現實主義詩論》（1929）；但實際上，正如林巾力指出的：「西脇所謂的『超現實』往往與『超自然』同義，他甚至在後來再版的《超現實主義詩論》序文中提到，當初以『超現實』為書名其實是出版社編輯所杜撰，而他原來的構想是超自然」⁵²。有趣的是，當陳千武在《笠》第3期（1964年10月）介紹西脇，他雖認識到西脇係「用意識或意志（即「主知」——引用者註）來創作詩的美的世界，顯然與一般超現實主義者以無意識寫詩的方法有所不同」⁵³，但他仍稱西脇為一位「超現實主義的介紹者和信奉者」⁵⁴；但在杜國清〈日本現代詩鑑賞〉的

⁵¹ 杜國清，〈寫在翻譯「惡之華」之前〉，《笠》第48期（1972年4月），頁75。關於翻譯時的參考譯本，杜國清自述：「我在大學裡修了兩年的法文，還不足以完全直接了解原文意思。這次我所以膽敢越權來翻譯法文詩，一是因為我對波特萊爾的興趣，二是因為我有日文和英文的翻譯本可供參考。我相信自己對日文和英文的理解能力足以幫助我了解原文；此外我相信自己的人性中也含有一些『魔性』」。

⁵² 林巾力，〈主知、現實、超現實：超現實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實踐〉，《台灣文學學報》第15期（2009年12月），頁90。

⁵³ 陳千武，〈關於西脇順三郎〉，《笠》第3期（1964年10月），頁12。

⁵⁴ 陳千武，〈關於西脇順三郎〉，頁12。

西脇順三郎介紹，「超現實主義」一詞甚至未曾出現。顯然，杜國清並非透過一般日本文學史的脈絡將西脇理解為超現實主義者，而是從做為西脇詩學體系之集大成的《詩學》(1968)，理解西脇所謂的「超現實」其實追根究柢就是波特萊爾所說的「超自然」⁵⁵，並從這裡對波特萊爾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杜國清而言，他眼中的西脇與其說是西方超現實主義理論的引介者，不如說是「西洋與東洋精神的調和者」。他在〈西脇順三郎的詩論——殉美的瀆神者〉(1980)寫道：

西脇將西洋詩的主知精神，與東洋的哀愁美感，融合在一起。……換言之，他將西洋自亞里士多德至現代的主知理論，建立在抒情性極重的日本詩土上。他的詩論是近代東洋與西洋詩精神的一大融合。在主知精神上，其理論對於日本傳統乃至明治大正時代的詩觀而言，無異乎瀆神的異端；就其求美的藝術精神而言，誠然是個殉美的唯美主義者。⁵⁶

有趣的是，杜國清也同樣在最足以代表波特萊爾象徵詩觀的〈萬物照應〉(“Correspondances”)中發現，「波特萊爾的『萬物照應』，與華嚴哲學所闡釋的『一多相印』的原理是相通的」⁵⁷，認為兩者相互呼應、「東西交輝」。當杜國清循著英美的艾略特發現日本的西脇順三郎、再循著日本的西脇順三郎發現法國的波特萊爾，至此，似乎遇到了一個有趣的折返點——或甚至可以說，西脇順三郎與波特萊

⁵⁵ 杜國清翻譯的西脇順三郎《詩學》是這麼寫的：「如果按照波特萊爾的理論：詩是超自然主義 (transcendantal)，是『哀樂你』(ironic——反語諷刺。)所謂超自然的世界是想像的世界。因此，詩不可以是自然或現實的世界。亦不能不是所謂『理念』(idée)之世界的『超自然』的世界。超自然的世界，或者超現實的世界是想像中的思考世界。詩即想像。」《詩學》(台北：田園出版社，1969年)，頁1。

⁵⁶ 杜國清，〈西脇順三郎的詩論——殉美的瀆神者〉，初出：《西脇順三郎的詩與詩學》(高雄：春暉，1980年)；收入杜國清，《詩論·詩評·詩論詩》，頁137-138。

⁵⁷ 杜國清，〈萬物照應，東西交輝〉，《詩論·詩評·詩論詩》，頁98。

爾詩論中的東洋／西洋的融合、或東方／西方的交輝，意外成為杜國清東洋／東方回歸的一條迴路。1974年2月《笠》第59期，唐谷青（杜國清）的〈日本現代詩鑑賞〉停刊，改刊出〈鑑賞·李賀詩歌評釋〉，至《笠》第62期（1974年8月）共刊出四回。文章的特點，係大量加入了中、英、日文引註，並嘗試將李賀詩翻譯成英文。當然，這是杜國清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東亞所博士班的研究題目的材料；但值得注意的是，這應該可以視為杜國清將中文作品外譯的起點。此外，類似於杜國清在西脇順三郎詩論中發現西洋主知與東洋哀愁之融合、在波特萊爾「萬物照應」概念中發現其與華嚴哲學「一多相印」的「東西交輝」，在李賀研究成為國際漢學一樁盛舉之際，杜國清也在中國唐代的李賀詩中發現其「浪漫主義的悲切激情與世紀末的病態感性都極為強烈；我認為這是李賀詩引起歷代悲憤文人與現代詩人共鳴和激賞的主要因素」⁵⁸。亦即，在東方的詩人李賀身上，發現其擁有西方浪漫主義以及世紀末頹廢的現代特質。

四、結論：從翻譯世界到翻譯台灣

在杜國清赴美的1970年代，陳千武也展開了新的翻譯方向。第一是台灣現代詩的外譯及與亞洲詩人的交流。透過與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在1960年代末的交往，他不斷尋求著讓「笠」同人或台灣詩人與日本詩壇交流的機會。1970年11月，其主持編譯的中日文對照的《華麗島詩集》，由東京若樹書房出版；1979年則與北原政吉共同編譯《台灣現代詩集》，由熊本もぐら書房出版。1980年代，以陳、高橋、以及韓國詩人金光林（1929-）為核心，開始舉辦「亞洲詩人會議」，並出版中、日、韓、英語對照出版的《亞洲現代詩集》。從1981年至1995年共出版七集。第二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的中譯。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新

⁵⁸ 杜國清，〈李賀研究的國際概況〉，《詩論·詩評·詩論詩》，頁170。

文學的雜誌報刊史料陸續出土，其中有不少以日本語書寫。戰前出生的日語世代作家鍾肇政（1925-）、葉石濤（1925-2008）都投入了翻譯；而在詩的方面，陳千武也翻譯了相當大量的作品，遠景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中屬於新詩的四冊《亂都之戀》、《廣闊的海》、《森林的彼方》、《望鄉》即為陳千武的業績。⁵⁹史料的出土與翻譯，使得陳千武於1970年提出的「兩個球根」論有更堅實的文學史料作為依據，並進一步奠定日後「台灣文學」學科建置的基礎。

而在1996年，杜國清在美國創刊《台灣文學英譯叢刊》（*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其宗旨：「是將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有關台灣文學的聲音，亦即台灣本地的作家和研究者對台灣文學本身的看法，介紹給英語的讀者，以期促進國際間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和動向能有比較切實的認識，進而加強從國際的視野對台灣文學的研究」⁶⁰。當然，台灣文學的外譯並非始於杜國清，⁶¹但以這樣的規模、視野在二十年間持續將台灣文學英譯介紹給英語讀者，《台灣文學英譯叢刊》無疑是相當重要的。而這樣的台灣文學英譯工作，也許可以說，是一方面受到陳千武1970年代以降致力於台·日·韓三國亞洲詩人詩作的外譯與交流的啟發，同時又在陳千武等前輩們透過論述的建構、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翻譯而得出的「台灣文學」的認識基礎上進行的。

從為台灣翻譯世界，到為世界翻譯台灣，戰前世代的陳千武與戰間世代的杜國清從各自的起點與美學感性出發，他們的軌跡時而交會、時而交錯，卻也互相發明，開拓了彼此與台灣文學的視野，同時也將台灣文學帶到世界裡去。

⁵⁹ 另一主編為羊子喬。陳千武負擔了其中相當多詩作的翻譯。

⁶⁰ 杜國清，〈《台灣文學英譯叢刊》出版前言〉，《台灣文學與世華文學》（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頁3。

⁶¹ 可參考杜國清，〈從英日翻譯的取向談台灣文學形象〉中對於台灣文學作品英譯、日譯的回顧。收入杜國清，《台灣文學與世華文學》，頁245-276。

參考書目

史料復刻

- 白先勇等，《現代文學》（台北：現文出版社，1991年）。
- 春山行夫監修、中島善彌纂修，《詩と詩論》（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79年）。
- 笠詩刊編輯委員會編，《時代的眼·現實之花：《笠》詩刊1~120期景印本》（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

專書·文集

- 白先勇等，《現代因緣》（台北：現文出版社，1991年）。
- 西脇順三郎著、杜國清譯，《詩學》（台北：田園出版社，1969年）。
- 杜國清，《台灣文學與世華文學》（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5年）。
- 杜國清，《光射塵方·圓照萬象 杜國清的詩情世界》（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 杜國清，《詩論·詩評·詩論詩》（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
- 阮美慧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20 陳千武》（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年）。
- 和田博文編，《近現代詩を学ぶ人のために》（東京：世界思想社，1998年）。
- 洪淑苓，《孤獨與美：台灣現代詩九家論》（台北：釀出版，2016年）。
- 原子朗編，《近代詩現代詩必攜》（東京：學燈社，1989年）。
- 陳明台，《台灣文學研究論集》（台北：文史哲，1997年）。
- 陳明台，《逆光的系譜：笠詩社與詩人論》（台北：前衛，2015年）。
- 陳芳明，《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台北：聯經，2013年）。
- 麥穗，《詩空的雲煙：台灣新詩備忘錄》（台北：詩藝文出版社，1998年）。
- 樋口良澄，《鮎川信夫、橋上の詩学》（東京：思潮社，2016年）。

期刊論文

- 林巾力，〈主知、現實、超現實：超現實主義在戰前台灣的實踐〉，《台灣文學學報》第15期（2009年12月），頁79-110。
- 陳允元，〈尋找「缺席」的超現實主義者——日治時期台灣超現實主義詩系譜的追索與文學史再現〉，《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6期（2013年4月），頁9-45。

杜國清在《現代文學》與《笠》的發表（1962~1976）

作品	發表刊物	發表年月
飛（譯。史坦貝克）	《現》12	1962年2月
春·囚（詩） 葉慈詩選（譯。葉慈）	《現》13	1962年4月
蛙鳴（詩）	《現》14	1962年6月
風（詩）	《現》15	1962年12月
候鳥、雲（詩） 寫在密林詩抄之後（論）	《現》16	1963年3月
樓梯（詩） 蛙鳴集後記（論）	《現》17	1963年6月
雨中行、復活（詩）	《現》18	1963年9月
島與湖（詩五首）（詩）	《現》20	1964年3月
行列的焦點（詩） 論聽覺的想像（譯。艾略特）	《笠》1	1964年6月
島與湖（續）（詩） 艾略特論文選輯（譯。艾略特）	《現》22	1964年10月
作品合評（論） 論批評的功用（譯。艾略特）	《笠》3	
飛行思想（詩） 作品合評（論）	《笠》4	1964年12月
駝鳥只愛在沙漠奔跑（詩）	《現》24	1965年4月
詩是——（論） 空洞的人（譯。艾略特）	《笠》10	1965年12月
普魯洛克與其他的觀察（譯。艾略特）	《現》27	1966年2月
J.A.普魯佛洛克底戀歌（譯。艾略特）	《笠》11	
荒地（譯。艾略特）	《笠》12	1966年4月
田園變奏曲（詩） 關於「荒地」（論） 荒地（譯。艾略特）	《現》28	1966年5月
艾略特詩選（譯。艾略特）	《笠》14	1966年8月
艾略特作品（譯。艾略特）	《笠》15	1966年10月
磐石底合唱（譯。艾略特）	《現》30	1966年12月
艾略特詩選（與沙白合譯。艾略特）	《笠》16	
旗的傳奇（詩）	《笠》17	1967年2月

艾略特詩選（譯。艾略特）		
艾略特詩選（譯。艾略特）	《笠》18	1967年4月
河上祭（給笠同人）（隨筆）	《笠》19	1967年6月
艾略特詩選（譯。艾略特）		
艾略特的詩（譯。艾略特）	《笠》20	1967年8月
艾略特的詩（譯。艾略特）	《笠》21	1967年10月
※笠下影（杜國清）	《笠》22	1967年12月
小論詩的批評（譯。艾略特）	《笠》28	1968年12月
紅葉（詩）	《笠》29	1969年2月
傳道者亞瑟的酒歌（詩）	《笠》30	1969年4月
寄天儀的信（隨筆）		
寄桓夫的信（隨筆）	《笠》31	1969年6月
山海經（詩）	《笠》34	1969年12月
西脇順三郎詩學譯後記（論）	《笠》35	1970年2月
寄自美國（隨筆）	《笠》39	1970年10月
美國通訊（一）（隨筆）		
日本現代詩鑑賞（一）（西脇順三郎）※唐谷青	《笠》41	1971年2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二）（安西冬衛）※唐谷青	《笠》42	1971年4月
新作三首・戀（詩）	《笠》43	1971年6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三）（北川冬彥）※唐谷青	《笠》44	1971年8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四）（三好達治）※唐谷青	《笠》45	1971年10月
追思吳瀛濤先生（隨筆）	《笠》46	1971年12月
當代詩人與詩評家的課題（論）	《笠》47	1972年2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四〔五〕）（村野四郎）※唐谷青		
惡之華（連載）（譯。波特萊爾）	《笠》48	1972年4月
寫在翻譯「惡之華」之前（論）		
雪崩詩稿（詩）	《笠》49	1972年6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六）（丸山薰）※唐谷青 「抒情民謠集」序文（詩論譯介之一）		
寸草集（詩）	《笠》50	1972年8月
「雪崩」序（論）		
評「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集・序（論）	《笠》51	1972年10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七）（草野心平）※唐谷青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一九七二・日本（詩） 詩的辯護（譯。雪萊） 日本現代詩鑑賞（八）（金子光晴）※唐谷青 惡之華（連載）（譯。波特萊爾）	《笠》52	1972年12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九）（田中冬二）※唐谷青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53	1973年2月
童年憶影（詩） 日本現代詩鑑賞（十）（安藤一郎）※唐谷青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54	1973年4月
日本現代詩鑑賞（十一）（伊東靜雄）※唐谷青	《笠》55	1973年6月
作品三首（詩）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57	1973年10月
作品一輯（詩） 日本現代詩鑑賞（十二）（笹澤美明）※唐谷青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58	1973年12月
伊影集（詩） 鑑賞・李賀詩評釋（一）（論）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59	1974年2月
鑑賞・李賀詩評釋（二）（論）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0	1974年4月
心雲之歌（詩） 「笠同仁」的話（隨筆） 鑑賞・李賀詩評釋（三）（論）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1	1974年6月
李賀詩評釋（四）（論）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2	1974年8月
心雲集（詩）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5	1974年12月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6	1975年2月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7	1975年4月
熊貓集（詩）	《笠》68	1975年6月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69	1975年8月
火山之戀（詩）	《笠》71	1975年12月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72	1976年2月
廢園（詩） 惡之華（譯。波特萊爾）	《笠》75	1976年8月